

自然也会感到快乐和幸福。无论是共产党提出的“人民”概念还是公民社会提出的“公民”概念，在中国都是超越 56 个“民族”并涵盖了全体国民的，这是我们在结束“阶级斗争”历史阶段后建立新的政治整合和文化认同的核心概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彼此平等和相互尊重，才能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实现共同繁荣。（马戎）

【网络文章】

我的两位维吾尔族上级

陈新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在两位维吾尔族干部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读维吾尔人，明白了许多汉文化所不理解的事情。后来从事史志工作研究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回顾我与维吾尔族干部的交往，使我对新疆的维吾尔文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形成与许多汉族干部不尽一致的独有见解。

我属于“老新疆”，出生于喀什伽师县，中学毕业在兵团某团场当农工。在贫困团场工作 18 年，任职基建参谋（正连职）。1981 年中央决定恢复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被调到喀什兵团农三师宣传处当新闻干事，后为副处长、文联主席。在师部工作 15 年，此间我的直接领导是两位维吾尔族副政委。与维吾尔干部的共事有许多感受，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不可能有的宝贵知识。有的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与维吾尔族领导长期共事，长期生活，以心换心地交流，才能真正理解维吾尔人；也才能理解北京来疆挂职干部感叹：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喀什不知治国之难。

1997 年我调到乌鲁木齐兵团史志办工作。研究了新疆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再看看新疆今天的现实，想说的话很多，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只能点到为止。

新疆的许多事需要解释，否则内地人看不懂。文中涉及几个新疆的专用术语解释一下：

民族感情就是千百年来各民族对本民族的深厚的感情；民族情绪就是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强烈感情；地方民族主义就是把本民族利益凌驾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主张；民族分裂就是主张成立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我们应当发自内心地尊重民族感情，充分理解民族情绪，教育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坚决反对民族分裂。

“三股势力”一为民族分裂主义，主张成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简称“东突”；二为宗教极端主义，主张排斥“异教徒”甚至发动“圣战”；三为恐怖主义，主张用恐怖手段达政治目的。美国的“911”事件即其例。

还有，“老新疆”指的是解放前后进疆的汉族人，大多懂点维语；“新新疆”指的是改革开放后来新疆的汉人，大多不懂维语。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敏感人物用化名。

维吾尔族的知识精英

我的直接领导先是 A 副政委，后是 E 副政委。岁数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年轻时在地方工作受到提拔重用，中年时调入兵团农三师担任领导干部的。A 副政委二十出头就当巴楚总场皮卡克村分场团委书记，后经过自治区党校、中央党校学习培训，头脑聪明，口才很好，汉语精通，汉文可达初中水平。皮卡克村分场 1969 年划归兵团农三师改为某团。他任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娶了汉族媳妇。完全是自由恋爱，A 副政委从不干涉子女婚姻，但也不与亲家来往。

E 副政委是典型的共产党培养的一代精通汉文化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他在喀什师范学院数学



系毕业，被选送北大数学系，正逢“文革”兴起，认识了“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创造者聂元梓。在北大“造反”的漩涡里，他被弄得晕头转向，几乎没有正规上课，后来居然拿到了数学研究生学位。实际上他半辈子学的政治，而且是用他的话说，是“变化莫测的政治”。在北京时断时续学习8年，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学院等。他可以把《孙子兵法》里的古汉语译成维文，可谓“汉学家”。在喀什那个时代的一大批维吾尔知识分子中，他以高学历、敢讲真话、颇有锋芒而名重一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担任县级主要领导；九十年代初，他由喀什行署监察处处长调农三师任副政委。他调入时，A副政委改任副师长。

两位副政委具有维吾尔领导干部的共同特点：头脑聪明，性格直率，正义感强，重感情，重家庭，重友谊，特别善于学习汉文化。同时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与汉族干部相处时特别明显。与汉族领导干部相比，他们没有工于心计玩弄权术，没有城府深沉喜怒不形于色，他们感情外露，直来直去，很好相处。

我在宣传处办了十几年的各种学习班，两位副政委都给维族干部学习班讲过课。我听过几次，大部分可以听懂。A副政委讲话，常用老百姓的语言，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学员们特别爱听。有次讲课讲到计划生育，他说，真主给了你们家一个馕，一个孩子吃不完，两个孩子吃刚吃饱，三个孩子吃都不够吃，四个孩子吃都饿肚子。你们说有几个孩子好？大家一片笑声，说两个好。他接了一句：真主是支持计划生育的！又一片大笑。

E副政委讲课理论性强，观点尖锐鲜明，学员启发大。有一次讲课说到中央为什么在“文革”后恢复新疆兵团，他问大家一个椅子是三条腿稳当还是四条腿稳当？回答当然四条腿稳当。他说，对啦！必须四条腿！新疆的社会稳定就要有四条腿，党政军是三条腿，加上兵团就是四条腿，新疆的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接着他幽默地说，以后你们坐椅子，回头看看是三条腿还是四条腿，坐在兵团这个椅子上。回应一阵笑声。

他们对我友善信任，十分看重；私下称我“付康”即兄弟。E副政委知道我出生在伽师县，向他的维吾尔同事介绍我时常说，这位是陈处长，老新疆，我的伽师同乡，汉族同乡。这一介绍常常使维吾尔干部对我表示友善，同时发出惊叹：阿拉！“匈达吗？”（是这样吗）。因为解放前出生在新疆喀什的汉人非常少。

他们认为我是“老新疆”，为人正直，心底透明，懂维语，通维文，又是他们的下级，心里话愿意对我讲，心里的郁闷愤懑，也可以对我当面宣泄。有时话题太敏感了，旁边有汉族干部，就直接用维语与我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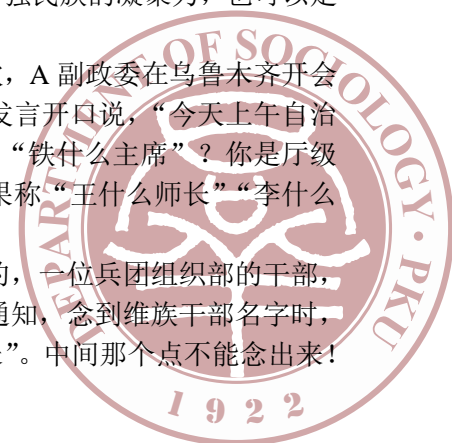
透过他们偶尔敞开的心灵的缝隙，我看到了许多汉族干部看不到的东西，听到了许多汉族人听不到的东西。我只能说两句：许多新疆的汉族人（更别说全国）没有真正了解维吾尔人；许多人不了解维吾尔文化，更不可能了解汉维两种文化的差别有多大。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越有知识的人，自尊心就越强；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这一点在两位副政委身上表现特别明显。我赞成学者的意见，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即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走向极端盲目排外。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自治区主席是铁木尔·达瓦买提。有一次，A副政委在乌鲁木齐开会回来，在车上愤愤不平地说一件事：在小组讨论上，一位汉族干部发言开口说，“今天上午自治区那个铁……铁什么主席讲了话”。我一听就火了！“铁”了半天了！“铁什么主席”？你是厅级干部，也五十多岁了，居然连自治区主席的名字叫不出来！我们如果称“王什么师长”“李什么政委”，你们听了会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几个维族干部，气得脸色都变了。还有更可笑可气的，一位兵团组织部的干部，可能长期在汉族单位工作，不知道维族人的名字怎么念，宣布任命通知，念到维族干部名字时，把名和姓中间的点也念出来了，“任命托乎提--点--库尔班，为副师长”。中间那个点不能念出来！



就没有人教给他吗？

E副政委也是这样。有一年元宵节，喀什市与农三师联合举办灯会。协商会是我去参加的，会后向E副政委汇报并通知了有关单位。节前年头工作很忙乱，办个灯会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我没去检查落实。那天E副政委打电话问我“你去检查过各单位制作的灯没有？”我答没有。他有点火气了：“你现在就去！地方上有人给我说取消这个灯会！”我立刻去了几个单位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那年正逢猪年，有的单位扎了不少猪灯！穆斯林群众看了会反感的。我打电话给E副政委建议：元宵节灯会按计划办，猪灯不挂出去。E副政委冷冷地说，算了，不办了。市政府已经通知我们了。

还有一次是国庆节前，通知各单位挂标语。标语内容发了文件要求汉维两种文字。那天，E副政委口气严肃地打电话给我说，你自己去看看某公司的标语。我以为标语内容出了什么问题，连忙骑车到某公司大楼前，一看才明白了，标语内容没有问题，只是汉文在上，维文在下。我找到公司经理，说要把维文放上面，经理不以为然，“钱都花了标语制好了，文字上下有什么关系？”我再三强调自治区有这方面的规定，经理勉强同意了。我向E副政委汇报，他叹了口气说，别忘了咱们这个地方是维吾尔自治区。我可以不计较这个事情；维吾尔群众会怎么看？

后来，他无意中漏出一句“怪不得我调兵团来工作时，朋友告诉我兵团有大汉族主义”。

“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我们的习俗就好了”

1998年夏天，一件血案震惊喀什。一个年轻力壮的维族卖肉摊贩持刀砍伤6名无辜群众，又造成两名警察一死一伤，后被当场击毙。喀什各族群众为牺牲的汉族警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那时我刚调到乌鲁木齐工作，E副政委到兵团来开会，特意来看我。谈到喀什发生的血案，他长叹一声：“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一点点维吾尔人的习俗，这个事根本不会发生。”

维吾尔人饮食有严谨的习俗，非清真不吃，非鲜活不吃。《古兰经》上有规定，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在喀什从未发生过市场上卖病死家畜肉的事。这一点很值得内地汉族人好好学习。牛羊肉是天不亮由阿訇念经后宰杀，天亮送到巴扎（集市），肉挂上架子十分新鲜，蜜蜂围着飞。肉贩子从不赶走蜜蜂，因为那是羊肉新鲜的标志。顾客尤其是汉族人不能用手摸肉，汉人饮食非清真。他们特别忌讳这一点。“你把肉摸脏了，我卖给谁去？你用眼睛看，看上了我给你割下来。”

那个汉族妇女不停用手摸肉，不理摊贩厉声制止。她挑了一块手摸过的肉叫摊贩切下来。过了秤后她却说不不要了，转身就走。摊贩大怒追上去，挥刀砍伤其胳膊，接着接二连三砍伤数名闻声而来的无辜群众。血案就因为一件小小的买卖纠纷发生了。

E副政委说，五十年代解放军进疆，首先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再加上纪律严格，很少有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发生。所以，直到今天，维吾尔群众还在说“老新疆好”。现在怎么样？内地大量汉族人进入新疆，谁对“新新疆”进行过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他们不顾一切，只知道赚钱，根本不知道少数民族的习惯。称呼少数民族“老维”、“皮帽子”，年轻的叫“巴郎孜”，年龄大的叫“老巴郎孜”，谁去批评教育纠正啦？还有“遥勒达西”（同志）只能在开会时称呼，出了会场不能用！在大街上你喊“遥勒达西买买提”是贬低人的……我们少数民族最重感情；也最怕伤感情。感情一旦被捅一刀，伤口很难愈合。

也谈“三股势力”等敏感话题

我与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共事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疆“三股势力”猖獗一时，动乱和严重恐怖活动多次发生。尽管他们对“敏感问题”比汉族干部更加敏感，尽管他们在汉族干部面前表态谨小慎微，但出于对我的信任、出于我们之间比较深的感情，他们不自觉地将对一系列“敏感问题”的真实看法在我面前流露出来。在整个师机关，也只有我这个汉族干部明白这些事。

1990年4月，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由“三股势力”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奉党中央国务



院命令，农三师民兵参加了平暴战斗。我随民兵到了现场。

A 副政委从北京学习回来，听我讲了民兵参加平暴的情况。在会上，他的表态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会后与少数民族干部交谈时，基本不提“三股势力”“反革命组织”等，而说：“那些人是‘疯子（精神不正常）’，他们可能吸了麻烟，不知道共产党多么强大？共产党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远的不说，去年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六四事件）闹事，结果怎么样？……”“碗豆跳得再高也砸不烂铜锅”！他们私下谈论最多的是巴仁乡乃至整个南疆的贫困落后。

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尔大清真寺大阿訇阿荣汗·阿吉和儿子遇刺重伤，震惊全疆。阿荣汗大阿訇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在穆斯林群众中威望很高。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师党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通报了情况，定性为“三股势力策动的严重刑事案件”。会后，我与E副政委两人相遇单独交谈。我把此案说得很严重，而他淡淡一句“这不过是教派之争。”

新疆的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的教法学派之一哈乃斐派，该派是正统派。但也有极少数人信奉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在新疆称为依禅派，也称“十二伊玛目派”。在历史上两派争斗，血案不绝。

他们认为阿荣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禅派所为。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会“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这是“三股势力”所为。

不久，传达中央文件，指出对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小组讨论会上有的汉族干部发言表达不准确，似乎少数民族在搞分裂。E副政委很不高兴说“汉族也有搞分裂的，台湾的陈水扁就是。不要一提反分裂就扯上某个少数民族。”

我思索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尽量避免使用“三股势力”一词？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或者保留不同看法？在新疆，当少数民族干部保持沉默或者一字不落把上级文件重复一遍时，就是他们有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不愿表达之时。

后来在与E副政委的多次个别交流中，我把他的片言只语连接起来，分析归类，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三股势力”之间有联系，但要具体分析。一个最简单的历史事实：维吾尔人没有建立独立国家的历史，至少近几百年来没有。“东突”理论在民国时期传入新疆，仅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广大老百姓没有文化，根本不知“东突”是怎么回事。1949年前，“东突”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1933年，沙比提大毛拉利用战乱，在喀什成立了“东突伊斯兰国”，一百多天就垮台了。第二次是1944年底，“三区革命”爆发，苏联出动军队，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年半后，斯大林担心引发中亚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的连锁反应，改变了主意，撤销了“东突”，以“三区民众参政会”名义与国民党和谈，成立了新疆联合政府。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友好，“东突”理论基本销声匿迹了。近年来，在国外敌对势力煽动下，“东突”分裂理论死灰复燃。但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是反对“东突”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国家。而且，“东突”的疆域包括了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国土，他们能接受吗？不能把所有闹事都往“东突”上扯。即使有极个别人想搞“东突”，只是在他的头脑里，他没有行动，你怎么反？

接着说极端主义。宗教信仰；宗教狂热；宗教极端主义；这些概念在现实中界限怎么划分？你怎么判断一个穆斯林对宗教是虔诚还是狂热？甚至到了极端主义？他不付诸行动，没法反。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恐怖主义，依法严打。不管他是“东突”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也不管他是报复社会，只要搞恐怖活动，露头就打，让他不敢搞。

况且，有的动乱是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化解长期积累引发的，与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换言之，是“三股势力”利用了社会矛盾。长期贫困；贫富悬殊；失业增多；官僚主义严重；特权思想等等；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化解，给“三股势力”提供滋生的土壤。

“你们要求少数民族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往民族问题上扯，你们也不要把所有闹事都往民族分裂主义上扯，新疆的许多事很复杂。许多闹事的人连什么是‘东突’根本不知道！”

我理解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观念。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可惜，我人微言轻，发挥不了



什么作用。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很有效，能让每个人自由发表个人的看法，多数人能听到少数民族干部的不同意见，新疆的局面可能比今天好得多。

“新疆的历史还是我们自己来讲”

我喜欢读书，每次和师领导下基层工作，别人带着扑克，我带着书。有次我随 E 副政委下团场工作。他坐在越野车前排，回头问我，这次下去带的什么书。我答《维吾尔族简史》。他一听来了兴趣，说拿来我看看。我从包里翻出来递过去。他首先翻看版权页，边看边说，你发现没有，讲维吾尔族的历史，五十年代出的书和八十年代说得不一样，现在出的和八十年代又不一样，以后再出书，还不知道会怎么回事呢！

八十年代初，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曾经组织批判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我认真读了那些批判文章。实话实说，我对那些批判文章持保留态度。即使批判也应该在学术范围内进行，没有必要在全社会开展，其结果是“吐尔滚理论”广为流传，影响比没有被批判之前更广。鉴于“文革”的深刻教训，我必须弄懂维吾尔族的历史，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问这本书怎么样？他翻看说，书是八十年代出的，内容是五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书可以看看，后来的书就“白坎儿啦！（没有东西啦）”为什么？我追问一句。他说，五十年代编书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不少从苏联留学回来，又经历了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统治，知识面广，那时还没有阶级斗争为纲，大家还敢讲真话，写出的书可以看看。包尔汉，精通维汉俄三种语言，在盛世才的监狱里编了《维汉俄大词典》。赛福鼎是大文学家，诗歌文章都好，精通历史。

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那时汉族知识分子精通维文的很少，几乎没有汉族人参加编写史书。

我说，后来历史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越走越偏了。他连连点头，说政治是不断变化的，你看党的路线变化多大，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等等，而历史是永远不变的事实，“让石头跟着鸟儿一样飞！行吗？”他眼望着三岔口光秃秃的山说。

我不喜欢酒宴玩乐，到垦区一有空就看书。那天晚饭后，我陪 E 副政委散步，又说起《维吾尔族简史》。他说，汉人最早创造了文字，而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有的甚至是解放后才由政府组织专家去给他们创造了文字。他们更多是口头传说，在汉文史书上没有记载。还有，古代与汉王朝打过仗有交往的游牧民族，汉文史书上有记载；没有打过交道的没有记载。你们讲历史完全依据汉文史书，这可能全面吗？

我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他又说了一句，我们民族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己来写。即使错了，由我们自己来修改。我明白，他是针对自治区党委组织对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的批判说这番话的。

接下来他说的一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你们说王洛宾是“西部歌王”，他的歌确实好听，我们也喜欢。但是，我们的音乐家说他是“纳和夏吾乎热（歌贼）”。他把少数民族的歌“偷”过去变成他的了。我们祖祖辈辈唱的歌，因为歌手不识谱，只会唱，他一听立刻把歌谱记下来，再编了歌词就成他的了。你们也就把他抬得高高的。我们认为真正的“歌王”是阿曼尼莎汗……

我无语了。阿曼尼莎是叶尔羌汗国的王妃，整理了著名的十二木卡姆乐谱，是维吾尔人最推崇的音乐家。

讲历史时突然跳跃到王洛宾，他们的内心怎么想的……

慰问宗教人士，喝“圣水”

A 副政委的父亲曾经是小海子垦区的大阿訇，宗教造诣深，在穆斯林群众中很有威信。我跟随他去慰问垦区的宗教人士，每到一家，他进门首先介绍：我是白克尔大毛拉的儿子。那些宗教



人士立刻喜形于色，热情招待。随行的团场维族干部接着介绍，是师里的副政委。那些宗教人士肃然起敬，连连点头“认识认识，知道知道”。

阿訇的笑容先是发自内心，后是出于礼貌。

A 副政委在慰问宗教人士时说的最多的事情是教育，小学的入学率是多少；有没有不去的？你们要教育群众送孩子上学。“先知说过，即使知识远在中国也当孜孜以求之”。还有，他接着强调宗教人士要发动群众勤劳致富，带头致富，“先知说过，最不能忍受饥饿和贫困”。

我很赞成 A 副政委的工作作风，少讲一些政策理论，少喊一些口号，多讲一些实际的东西，穆斯林群众容易接受的东西。教育，富裕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不论那个民族，不论那种信仰都是这样。

我开玩笑说，A 副政委，你口才太好了。大家特别喜欢听。走了好几家，你的话我可以背下来了。再到下一家你就说“我命令陈处长替我说”。

他天性乐观，哈哈大笑，好好好，下次你说。我自嘲道，我说没有用处，人家知道我的父亲不是大阿訇，把我当成赵本山的《卖拐》啦！人家一听，唢呐怎么吹出达甫（手鼓）的声音啦？

又一阵笑声。维吾尔人天生喜欢热闹笑声。

我心里清楚，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只有少数民族干部来讲才有效果。他们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他们确实不容易，既要坚持党性，又要与广大穆斯林密切联系；既要掌握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又要坚守本民族的精神家园。

那天到了一家阿訇家，院子里几间大房子里挤满了人，过节般热闹。我们一行到来，大家立刻恭恭敬敬让出一条路，一片“基勒克吗？（问候）”

原来，这位阿訇刚从麦加朝觐回来，亲友们都来庆贺。其中最隆重的仪式是每个人非常虔诚地抿一口“咋木咋木”泉水。

传说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初期，遭受麦加权贵们的迫害。妻子抱着婴孩躲避追杀，逃到麦瓦尔山时烈日干燥，孩子干渴哭泣。妻子放下孩子奔波找水，没有找到水回到孩子身边一看，孩子蹬着蹬着，脚下涌出了泉水。从此，朝觐者来麦加必须在麦瓦尔山来回疾走七次，掬饮泉水。此泉为所有朝觐者的“圣水”。

这位朝觐者用一个大塑料桶装了满满一桶“圣水”，来客用一个精致的瓷碗逐一品饮。

只有我一个汉族干部；我必须尊重穆斯林的风俗。A 副政委喝了一口把瓷碗递给了我，全场一片掌声。我虔诚地举碗过头，一饮而尽。众人注目赞叹。

坐在车上，余兴未尽。我说我读过汉文的《古兰经》，内容很丰富。A 副政委沉默一会儿说，新疆的阿訇们有个观念，《古兰经》只能用古阿拉伯语来读，翻译成任何文字都可能背离原意。他们不赞成翻译成维吾尔文，也不赞成汉文的《古兰经》。不过，我赞成，不翻译过去，其他民族怎么知道《古兰经》呢？怎么了解伊斯兰教呢？

闻所未闻。唉，我又白下功夫了！阿訇们可能是想垄断话语权吧。万一阿訇……玄乎！

那位朝觐者带回的“圣水”因为天热，旅途七八天，我喝了腹泻。但我不后悔。我尊重所有信仰宗教并严格遵守教规的人，不论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心诚则灵。我觉得世界上最可畏的，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很难理解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一个无神论者很难真正了解一个有神论的人的内心世界……

酒后听真言

那次我跟 A 副政委到维吾尔群众聚居的小海子垦区，这里是 A 副政委的老家，亲戚朋友很多，一天吃五六家甚至通宵。

我有个小小的疑问：A 副政委的儿子在这里娶了汉族媳妇，亲家在这里怎么不去看看。我私下问这里的汉族干部，说 A 在这里当政委时，他后来的亲家是机关的一个科长，他们基本上不



来往。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一直是新疆不可涉及的敏感话题。

A 副政委每到一家在介绍完我的职务后，总要加一句：他是“老新疆”，会维语。意思很明显，说话注意一点。

那天白天吃了三四家，晚饭在 A 副政委一个亲戚家吃。我们一行人中仅我一个汉族。主人家来了七八个维族干部。喝酒很猛，我假装醉了，不顾礼貌往大炕里边一滚躺下，谁叫都不答应。

他们看我醉了睡着了，交谈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收不住缰了。

“上海浦东发展太快了，高楼非常漂亮。外国公司招牌十公里外就看得见。夜里我们坐船顺江游玩，灯光连着星光，又倒影水中，真像作梦，进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神话世界。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非常现代化。但是一回到新疆，我们这里太落后了。我们那里大部分人还在喝涝坝水，人均收入只有上海深圳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穷？他们为什么富？把我们的资源全拿走了！石油、煤、棉花，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就这个样子西部大开发吗？我们的群众还在烧棉花杆！”

“你们口口声声兄弟民族，不错，你们是老大哥，但你们不是有一句话，亲兄弟，明算账吗？你们拿走了多少？还给我们多少？为什么不算清楚？”

“还要叫我们去向群众宣传要感恩！谁向谁感恩？搞错了吧？我们为全国的发展送出去多少资源？应该是所有用了新疆的石油、煤、电、气的省市向我们感恩！对！还有棉花！”

“他们说新疆的资源是全国人民的。”

“西湖、黄山、九寨沟都是全国人民的，你能把它们都搬到新疆来吗？在我们脚下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内地的汉族人对我们确实太热情，把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全拿上桌了。什么蛇、虫子（蚕蛹）、还上了一盘油炸蝎子！我心里一阵恶心想吐，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洗肠子，两三天光喝茶吃点干馕，不吃肉不吃炒菜。洗干净肠子，再吃自己家里的饭。汉族人怎么什么都吃啊！他们自己说，汉人是两条腿的人不吃，四条腿的桌子不吃，其他什么都吃！”

谈到八十年代自治区两个副主席一个汉族，一个维族，因权色交易贪污腐败被查处，降为厅级非领导职务。两个副主席都被一个汉族女老板拉下水了。

“处理太轻了！该送监狱！那个汉族女老板为什么不追究？那个汉族女人真不要脸！”

“一个（产品）出疆证，一个火车皮，一个（价格）双轨制，你只要占上一条就可以发大财。把任何一只瘦羊拴在这三个圈里，不久就肥得走不动路了。”

“现在把两只肥羊拉走了，又换上了两只瘦羊，老百姓又得用血汗把瘦羊催肥。还不如就一只羊，肥了不幸不换，一直养到死……”

大家大笑，又饮一杯。

在几届自治区主席里，他们认为最有威信的是司马义·艾买提，敢说真话，而且重感情。他六十年代在边防部队当兵，有一次去边防哨所，回来遇到暴风雪，迷了路，在雪堆里挣扎。被一个维吾尔牧民发现了，把他背回家里。牧民很穷，炕上只有毡片子。吃了热馕，喝了奶茶，他恢复体力，急着回部队。牧民有一双新靴子一直舍不得穿，珍藏着，看见这位解放军战士的靴子被雪水泡坏了，他把新靴子套在这个子弟兵脚上。牧民一直把他送出山去。后来，他当了和田地区专员，还专门派人去找这个牧民，没有找到。牧民不知跟着水草到哪里去放羊了。再后来，他当了自治区主席，上任临走时，专门给和田地区朋友交代，一定要找到这个救命恩人。那一年，果然找到了。他自己掏钱买了飞机票把这个牧民接到乌鲁木齐，亲自陪同参观游玩天池吐鲁番。牧民回去时，他特地买了一双最贵的牛皮靴送给了救命的朋友，说我永远记得你给我的那双新靴子，记得你对子弟兵的热爱！

“这才是真正的维吾尔人！”大家谈笑直到深夜。

酒后真言，难得一闻。司马义·艾买提的故事令人感动。他们谈论这件事还有一层意思：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中央工作时，乌鲁木齐的 7 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反对把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走！”等。



“资源民族论”令人忧虑。流行甚广，难以纠正。

我只有心里一声叹息：新疆的事情积重难返……

别忘了一个基本规律：人是以自己的利益来对待理论的，马克思说过“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被看成谬误的”。

“当官就得像个官”

汉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产物，而维吾尔人先祖回鹘人曾长期在漠北游牧，唐朝时西迁吐鲁番，建立高昌回鹘国，逐步向农耕文明转化，现代维吾尔族形成过程中又融合了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其文化烙上了浓重的游牧文明的印记。其特点之一，部落意识，头人意识很强。官就是“头人”，为部落负责，就要杀伐决断，敢作敢为，绝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迪罕（农民）”。

两位副政委私下都反感有的汉族领导的“研究研究”，他们说“研究研究”就是“抽完烟喝完酒再说”。他们在职责范围里敢于表态，口气威严，绝不拖泥带水。在涉及本民族利益时更是毫不含糊，态度明朗。

党管干部是一个原则。喀什各县党委书记都是汉族。在少数民族中，往往“汉族”和“共产党”、“国民党”是一个概念。他们说，你们汉族的思维，用人提拔干部总是挑选老实听话的人；这样不行，“亚瓦西阿丹木（老实人）”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没有威信，说话没有人听。他们认为县长必须是有威信的乡长；地区专员必须是有威信的县长；自治区主席必须是有威信的地区专员。

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兵团又保留了部队的“首长负责制”。他们要想说话算数，言出必行，不太容易，而且常常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办事。

那次在党校办少数民族干部学习班，学员是维吾尔族副团职干部。我忙着找教材，请教员，还要安排吃住。第二天就要开学上课了，按照兵团领导的惯例，报到那天，首长要看望学员。E副政委叫我去党校看看学员。那些学员对他十分热情，争相握手。他问有没有什么要求，那些学员说“纸拖鞋”穿着不舒服，洗脸间的固定脸盆用着不习惯，还有人没有带牙具毛巾。

E副政委立即回头对我命令说，每人解决一套脸盆；塑胶拖鞋，牙刷，毛巾。我心里一咯噔，学习班经费预算没有这一项，但我深知E副政委的心理，立刻连连点头。所有当官的“面子”不可驳。

从党校回来已经下班了，我立即给管钱的师领导打电话请求追加经费。师里是“一支笔批钱”。因为我办一次事情就要一次钱，一年下来不知要了多少次钱，“一支笔”早就不耐烦了，答复说学习班的经费已经批过了，“办个学习班哪有这么多事？谁答应给拖鞋脸盆，你找谁要钱去。”

下级对上级没有道理可讲，只有服从。

“一支笔”的话不能讲出去，讲了影响师领导之间特别是汉族领导与维族领导的团结。而E副政委的领导权威必须维护。我立即给党校校长打电话，叫他们先把钱垫付，明天早晨必须落实E副政委的指示，解决拖鞋脸盆等。等我们下次再办学习班时把这个窟窿补上。那位校长笑着说，你老给我们找麻烦。我说理解万岁，理解万岁，我给你打欠条，实在不行从我工资里扣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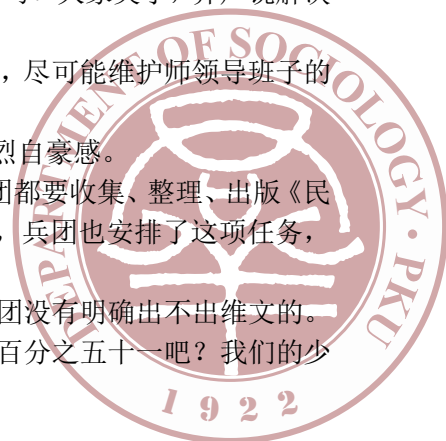
第二天开班E副政委作动员讲话，第一句话问拖鞋脸盆都解决了吗？大家笑了，齐声说解决了，他满意地点点头也笑了。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尽可能维护好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威信，尽可能维护师领导班子的团结，也算是忍辱负重吧。

A副政委也十分看重自己的领导威信，而且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自豪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兵团开会，领回一项任务，自治区和兵团都要收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自治区成立了“三套集成”办公室，兵团也安排了这项任务，但没有专职人员，也没有机构，文化处代管，经费各师自行解决。

我回师部向A副政委汇报，他突然问，出不出维文的？我答兵团没有明确出不出维文的。他口气有点生硬了，兵团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我们师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一吧？我们的少



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得很，有许多宝贝吗！为什么不出维文的？你马上向兵团请示。

我恭敬地点点头，心里说麻烦事又来了。

我的请示结果是：是否出版少数民族三套集成，你们师自定。好一个“自定”！他们也怕“谁安排的问谁要钱！”

A 副政委不容商量地对我说，这件事你牵头具体负责搞，不出维文的怎么行呢？少数民族文化也要好好发展吗！

新疆的许多事情，只要扯上民族问题就鬼神难测。汉文的三套集成已经搞得我头痛不已，要钱、聘人、到基层催稿等，维文的三套集成难度更大。

“一支笔”表态：兵团没有明确安排出维文三套集成；“谁安排的，你找谁要钱。”

我又被夹在中间了。天无绝人之路，幸亏我与师机关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干部关系不错，他们极积帮我想办法，提供了重要线索：小海子垦区有几个五十年代的老翻译，爱好民间文学，收集了不少故事谚语歌谣。

我立即到小海子垦区诚恳拜访，他们同意让我复印收藏的资料。有的团场也征集了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的资料。

但是，谁来编辑审查把关呢？我的维文水平远远达不到，况且我是汉文三套集成的主编，忙得焦头烂额。

也算天助我也！党委办公室调来一位翻译，叫阿布拉江，来自基层，三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正想到大机关创一番事业。我向 A 副政委推荐了他。A 副政委立刻把阿布拉江叫来，把维文三套集成任务交给他。小伙子欣然领命。

党办主任是我的老朋友，说你怎么挖自己朋友的墙角呢！阿布拉江是我的人，正要用他呢！我说我走投无路了。

A 副政委很喜欢文学，年轻时是“帅哥”，被挑选到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次我去他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维文三套集成草稿。他正在认真审稿，抬头看我一眼，满面喜悦，啧啧称赞道：这里面真有好东西！

我正为维文的三套集成出版经费发愁时，E 副政委从地方调来了，A 副政委改任副师长，分工管教育、卫生、民政等，都是有“活钱”的口子。几万元的出版费不成问题。无需我“死猪不怕开水烫”去找“一支笔”要钱了。

农三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出了汉维两本，受到兵团文化处口头表扬。全兵团有 8 个师出了三套集成，维文仅我们师的一本。其中甘苦，只有我心里明白：中国的官员们少一门社会科学——新疆少数民族心理学。

对汉文化的独特看法

自古以来汉人有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新疆的汉族人有一个普遍的共同观念，少数民族越精通汉文化就越亲近汉族人。这个观念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因为你忘了辩证法，没有想想他们会怎么看待汉文化中的糟粕——他们称为“脏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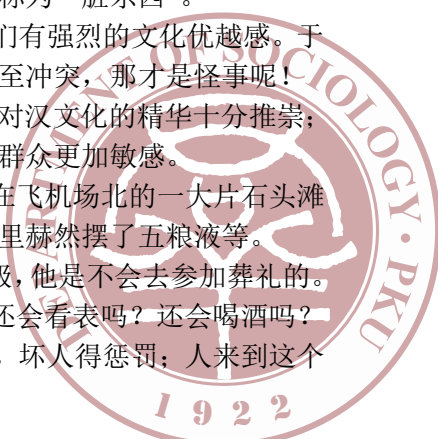
还有，现代维吾尔族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不少部落和族群，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于是，两个都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迎面相遇了。没有隔阂、矛盾甚至冲突，那才是怪事呢！

两位维族领导精通汉文化；A 副政委的两个儿子娶了汉族媳妇；对汉文化的精华十分推崇；但是，他们对汉文化中的“脏东西”非常敏感，比不懂汉文化的一般群众更加敏感。

有次我与 A 副政委去为一个团职汉族干部送葬。喀什汉族公墓在飞机场北的一大片石头滩上。出殡车上一路撒纸钱，下葬时亡者穿着新衣服，戴着手表，墓穴里赫然摆了五粮液等。

A 副政委是参加葬礼的唯一维族干部。如果他不是去世干部的上级，他是不会去参加葬礼的。

回来的路上，A 副政委终于忍不住了，长叹一声对我说，人死了还会看表吗？还会喝酒吗？还会花钱吗？维族人认为，人死了灵魂就升天去见真主，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惩罚；人来到这个



世界上赤条条的啥也没有，人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带走那么多东西？真是。

我委婉地说，汉族人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他们老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活着的人为了表示希望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活下去，他爱喝酒就送他酒，他爱那块手表就让他带走，这是寄托一个心愿希望。其实，谁都知道人死灯灭，什么都没有了。

A 副政委一声不响，只摇头。看着风中飞起的纸钱，突然回头问我，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苦笑了一下，绕开这个问题，说我死了一定火葬，学周总理把骨灰撒了什么都不留。我知道维吾尔人主张速葬薄葬，白布裹身，黄土为穴，没有任何陪葬品。我很赞成他们的生死观：我从真主那里来时一无所有，我回真主那里去时一无所有。

作为北大数学系研究生的 E 副政委对汉文化的看法更加深刻。有次我们聊天，他说，我上小学初中时，对汉文化非常热爱，那时的教育都是正面宣传，英雄主义。但是，上喀什师范学院时，有一次去喀什纺织厂一个同学家里，有个汉族工人从老家把老母亲接来了，那老太太是小脚。我第一次看到小脚老太太走路，摇摇摆摆，随时可能摔倒。当时对我震动太大了。我第一次知道汉人的祖先曾经这样虐待妇女！我疑惑了：为什么书本上没有告诉我这些啊？

我说，汉文化里有糟粕，有“脏东西”，必须克服。各民族之间应该是互相学习优点，自己克服缺点，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

他说，那是对的。新中国怎么样？妇女解放，反对缠脚丫子，新疆的妇女没有戴面纱的了。妇女是半边天啦！但是，后来怎么样？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女人写的；第一个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是女的；几个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女的；江青就更不用提了，是个坏蛋女人！把“伟大领袖”的形象都损害了！

E 副政委后来告诉我：“文革”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全盘颠覆了汉文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小人和女子难养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等，把汉文化中的糟粕“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反感和强烈排斥心理。原来汉文化里有这么多“脏东西”！你想，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父母兄弟之间都以阶级划线，“亲不亲，线上分”，提倡儿子批判父亲，兄弟互相斗争，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而我们这个民族重亲情，重感情，伊斯兰教提倡“信奉真主都是兄弟姐妹”，主张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纯洁。基督教也是主张“信奉基督都是上帝的子民”。不管他们能不能做到，至少他比“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游街，抄家，打砸抢”合乎人性吧！这就是“文革”结束后，你们说的“宗教狂热在南疆普遍兴起”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次，E 副政委路过某县时要去看看一个维吾尔族副县长。那个副县长很年轻，对我们非常热情，对 E 副政委非常亲切。

E 副政委在这个县里当过县委书记，发现这个年轻人在乡里工作出色，就重点培养他，不久当了副县长。听说新上任的汉族县委书记，对这个年轻的副县长不满意，公开几次点名批评他工作不大胆，不敢严格管理下级。弄得这个“年轻干部好苗子”好没有威信，心情沮丧。

那个年轻干部诉说心里话：我才三十几岁，那些村长有的五六十岁，胡子那么长，我怎么能因为对他们工作不满意就训斥他们呢？他们是我的长辈啊！E 副政委问那个县委书记，批评你时你没有给他讲这些吗？他说讲了。书记怎么说的？书记说，你是县级领导干部，不管你的下级胡子有多长，辈分有多高，该批评就批评，该收拾就收拾。

此前，我们在车上说了顺口溜：村干部是打出来的，乡干部是骂出来的，县干部是吹出来的，地州干部是送出来的。

E 副政委对那个年轻干部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怎么“收拾”？揪着胡子骂一通？他（汉族书记）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当了官就六亲不认。别忘了我们是维吾尔人！

话中有话：汉族领导为了“政绩”可以不讲亲情，有了“政绩”升官走人，我们祖祖辈辈还要在这里做人哪！……

难忘的“高峰论坛”



听听那些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心里话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宝贵的——不管他们说的对与错，能听到，就是打开的另一扇天窗，让你知道除了汉文化的天地之外还有另一番天地。

E副政委上喀什师范时的同学都快六十岁了，不是县级就是教授、博导等等。有几个出过一摞子书，在喀什名气很大。

我在调到乌鲁木齐之前，参加过E副政委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使我久久难忘。那是真正的“高峰论坛”。

只有我一个汉族，听了E副政委的介绍，大家都很信任我，于是“提起闸门放水——想怎么流就怎么流”，畅所欲言。

在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新疆问题民族问题是永恒的话题。

他们认为新疆的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一是毛泽东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高指示没有人敢不听。被神化为“救星”，代替了真主的权威；二是大家都讲阶级，民族界限模糊了，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民族意识压下去了。全社会只讲阶级成份，不讲什么民族；三是那时新疆西藏工资在全国最高，再加上革命英雄主义，支援边疆虽然艰苦但很光荣；四是那时党风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融洽，基层政权稳固。没有公开的特权阶层，没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五是各民族之间利益冲突很少，全党重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会积累社会矛盾，引发闹事。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全国大饥荒，新疆闹大事了吗？六是解放前南疆的大地主同时也是宗教上层，经过土改、镇反运动，宗教的影响力大大减少。许多村庄的清真寺坍塌了。

现在呢？不说了！谁心里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楚。

他们对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等提出一系列质疑：

我国的民族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五六十年过去了，怎么民族越划分越细越多了？民族之间界限越来越清楚了？民族之间隔阂越来越深了？我们的民族理论是从苏联引进的，现在苏联解体了，我们为什么还紧抱这个理论不放？根据这个理论，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搞错了吧？有的人群千百年生活在深山老林，几乎与世隔绝，处在原始部落阶段，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把他们命名为什么什么“民族”，没有文字给你创造文字，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再成立什么什么“自治县自治乡”。“原始部落”怎么能与“现代民族”相提并论呢？

我们的路子是：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四个标准划分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民族问题完全政治化了！

宗教的路子简单得多：信奉《圣经》，你就是“上帝的子民”，信奉《古兰经》，你是穆斯林“兄弟”。宗教跨越了种族、国家、民族等界限，形成强大文化力量。

民族问题尽可能不要政治化，要突出一点：文化！向宗教学习！要重文化，轻种族。

“都是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把我们排除在外了！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藏族人松赞干布的子孙，我们是乌古斯汗的子孙，西南少数民族也各有祖先。你们算一算五十六个民族中有多少个祖先不是炎帝黄帝？难道他们都不属于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这又把我们排斥在外了！我们的祖先回鹘人的图腾是狼。

一位老教授多次到内地、西藏考察。他的观点令人吃惊：什么是中华文化？三部分组成，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新疆伊斯兰文化。凡是信奉这三种文化的都是中华民族。“西南那些少数民族是穿着祖先衣服的汉人，因为他们全盘接受了汉文化。”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我们承认汉族人最多，汉文化是主流文化，但我们的文化，藏族人的文化放在什么地方？“民族融合是你融合我，还是我融合你？”

正好端上来了一盘香喷喷的油馕，那位教授即席发挥：“麦子，包谷，小米，大米，青稞等等，五十六种粮食糅在一起，烤成一个大馕，好不好吃？能不能拿得起来？那些研究民族理论的专家们先研究一下这个馕的问题。”一片笑声。

维吾尔人的语言天才不得不佩服。

新疆是十三个世居民族的新疆；维吾尔族是主体；不然为什么在自治区前面加了“维吾尔”？



毛泽东说过，解放军进疆是“替历代汉族统治阶级还债的”；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还说三区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八十年代的“西藏六条”最后一条是撤走汉人，新疆也传达贯彻了。很快又停止了。

“我们现在不提汉族还债的话，就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欠了自己民族的债，该说的话没有说，该争取的利益没有争取。现在，我们要给本民族还债了。什么叫自治？中央政府管三个权，军队，宪法，外交；其他权力归自治区”。

“其实，他们心中非常清楚新疆是谁的新疆”。

谈到苏联解体，大家都说是大好事。“八九十年前，苏联十月革命探索了一条新路子，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俄为师；现在，俄罗斯人又在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子。走不通，我们不跟着走；走通了，我们再来一个以俄为师。有什么不好”。

他们还谈了斯大林支持“东突”；外蒙古独立等问题。

当时我想：为什么在我们的各级人代会上听不到这些声音呢？为什么不能以兄弟身份坐下来好好交心呢？

位卑未敢忘国忧

在南疆生活了四十九年，与少数民族干部共事，又经历了多次动乱，我成为一个充满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的人。我和所有朋友交谈几乎都是新疆的民族问题，长治久安问题。我的记载南疆“文革”和一系列动乱的纪实文学《大漠足音》等，在网上点击率也比较高。

2009年6月，我和几位喀什的朋友在乌鲁木齐黄河路聚餐，一直聊天到深夜。我预言新疆将可能出大问题，而且就出今年。

朋友笑我杞人忧天，说中央领导说了现在是新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我执拗地说，别忘了辩证法，“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现在是新疆历史上社会矛盾最复杂最集中的时期；物质的丰富代替不了文化的隔阂矛盾；况且，骄兵必败是永远的真理。

我特别讲了一本应当引起自治区高层重视的书《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其中作者王力雄记载的“穆合塔尔”的“东突理论”。南疆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心里话等等，我比作者早十几年就亲耳听到过。作者的立场、理论全错了，但其所见所闻是真实的。

我断言“如果邓玉娇是到内地打工的少数民族姑娘，暴乱将立即发生！”有朋友摇头：“言重了。不会那么严重。”

结果，一个月后震惊世界的“七五事件”爆发了。6号上午，朋友从喀什打来电话：你的预言应验了！太可悲啦！太不可思议啦！把那本书《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传给我。

其实，并非我有先见之明。我的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启发了我，给我第三只眼以新的视角看待新疆问题，传达给我来自少数民族的真实信息。我身在乌鲁木齐，却一直关注着南疆的社会动态，特别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群众心理倾向。

喊“狼来了”，狼不会来；喊“狼没有了”，狼会来的。这是常识。官员的“政绩”里不包括社会矛盾，社会群众心理。也没有多少官员好好下功夫去研究这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哀！

1997年5月30日，我到乌鲁木齐兵团机关报到。前一天，住在三师驻乌办事处。早饭与E副政委一起吃。他刚从北京要救灾款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前，喀什发生强烈地震。全国的救灾款及物资全部交给地方，兵团地震灾区被边缘化了。农三师组织一批干部赴京汇报受灾情况，要求单独给兵团灾区“切一块蛋糕”。

他说，如果我在家参加常委会，一定不同意放你走，建议师党委提拔重用你。我说，谢谢您对我的看重。我在三师工作了33年，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三师；三师也没有亏待我，给我一个处长；我很感谢师党委。我现在49岁了，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在乌市工作。我离退休还有11年，这11年我要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人一辈子最好的归宿。E副政委点点头：从师里的工作出发，不放你走；从你家人团聚来讲，只好放你走了。

